

YONGLING WENJI

永龄文集

徐永龄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YONGLING WENJI

永龄文集

徐永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龄文集 / 徐永龄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36-7436-6

I. ①永…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第 017800 号

书名:永龄文集

作者:徐永龄

出版人:郑可

封面题字:潘立纲

责任编辑:王冰平 王宗琦

责任印制:陈善军

装帧设计:陈熙颖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0,63683011,63683015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3.25

字数:425 千字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7436-6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言

很高兴,《永龄文集》即将面世。感谢徐老师的信任,将他的文集交我安排出版。令我惶恐的是,徐老师再三嘱咐要我为他的文集作序。其一,我从未为人作过序;其二,徐老师是我的师辈,作为学生辈岂敢妄为?但恭敬不如从命,只得勉强为之。

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认识了在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的徐永龄老师。一叙,他原是老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首届毕业生,后从安徽劳动大学又回到他原先任教的教育学院,我是安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的,算起来他是我的正宗学长。我也是学现当代文学的,专业相同,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他的好多文章发教院学报时,都是我担任责编的。在教院老师中,我与他交往最多。1992年他带我参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国际性的潮汕籍华文作家创作研讨会。这次会议开阔了我的学术眼界。徐老师与我真可谓亦师亦友。我离开教院18年,他是我尚有联系的教院同事中为数不多者之一。2010年年初,徐老师要去安徽省图书馆“新安百姓讲堂”讲胡适,要我找几本关于胡适的书,我立即带上书送到他府上。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初开车不久,不认识到他所在的小区金色池塘的路,还是请社里的司机开我的车载我过去的。

初见永龄先生,他那时50左右,尚未像今天满头银发。他一派学者风度,在教院老师中是颇为出众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接触之后,更感到他颇具学者品性。他为人治学十分严谨,真可谓一丝不苟。他交给我的稿子从来都是工工整整的。他治学更是十分扎实。他研究作家时非常注重认真地研读其作品,往往会做大量的笔记,在此基础上,再展开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最终形成文章。所以他的每篇文章往往都资料丰富,内容扎实,立论准确,论证严谨,没有无的放矢的空论,没有不着边际的虚谈。在当年学风相对浮躁的背景下,永龄先生治学风格显得与众不同。这也是

我之所以特别敬重他的地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永齡先生学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一些有分量的论文也大都产生于这一时期。比如他对谢冰莹、张恨水、黄维樑和东瑞研究的几组文章就很见功力,代表了其真实的学术水准。像《东瑞散文论》一篇可谓鸿篇巨制,全文以10个部分9万字的大篇幅,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与分析了香港小说散文名家东瑞的散文创作,在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实在并不多见。特别在当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常见浮光掠影式的评介文字的大背景下,更凸现永齡先生在此研究领域治学之严谨,功底之厚实。再如,他对黄维樑教授著作的研究更超出了通常的文学创作研究范围,而进入了香港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范畴,这不仅在当年,直至现今也仍然是不多见的。又如他研究张恨水散文的系列文章,也是分量很重、填补“张恨水研究”某些空白之作。可以说,他在开拓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方面和介入张恨水研究工作中,确实做出过自己的努力。

总之,永齡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和张恨水小说创作的研究,功力深厚,成果丰硕,贡献颇多,令人称道。《永齡文集》的出版,其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

是为序。

万直纯

2013年3月14日



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代自序)

这部书是个人首部也可能是今生唯一的一部学术文稿结集。毕竟岁月如流水,人生已现夕阳,学术生涯余生恐怕难以为继了。

本书收集了笔者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论文 31 篇,除长论《东瑞散文论》被节选刊发外,大都曾在海内外报刊、学术文集公开发表。全书内容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和张恨水研究三大板块构成,大体反映了个人上世纪最后 20 年间的学术生涯与小小的研究成果。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大学毕业走上文学教学岗位,至世纪末离开大学教坛,我整整从事了 40 年的文学教学工作。虽然间或涉猎过一些相关的学科,但主要承担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及其范畴内的多项专题教学任务。所以严格说来,教学工作是我的主业,而学术研究只能是服务于教学或教学之余的副业而已。

忆及当年刚刚走上大学讲坛的时候,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教学工作。认真备课,学会教书,搞好课堂教学,成为压倒一切的要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把原本应同教学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摆在重要位置。加之人所皆知的历史原因,那一时期大学文科教学的学术环境并不很好,研究气氛又相对淡薄,个人几乎很少有参与学术研究的意念、动力和机会,自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面世了。勉强算得上略带学术研究色彩的文字成果,大概就只有数量可观的教学笔记与讲义讲稿了。虽然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每每忆起那逝去的岁月,仍感惋惜、遗憾与赧然。

个人真正称得上学术研究的笔耕生涯,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的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新时期的开始,大学文科教学与学术研究氛围开始迅速改观,个人也开始了学术研究活动和学术论文的尝试写作。先是结合专业

教学需要,相对强化了对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老作家、大作家、名作家的专题性研究,特别对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享有盛誉的经典作家,和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戴望舒等曾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诗人,更多有所侧重,力求教学研究学术化,学术研究专题化,作家作品文本研究系统化。为此,撰写了大量的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讲稿、文稿。但是由于个人学术水平的局限,当时学术园地的极端稀缺,加之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突破创新客观上有很大的难度,因而想写出并发表既有学术水准又独具学术创新意义的论文,平心而论,远非个人力所能及。所以,虽做了大量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但得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却少之又少。未能为我教了40年的现代文学的学术建设做出什么贡献,始终是个人的一大憾事。

也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潮流的涌动催生下,在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我开始介入正在兴起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介绍与研究的学术热潮。就时间起点而言,我的涉足该研究领域并不算晚,甚至算得上是比较早的被卷入者。先是台湾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解读开始,由于作品文本与作家资讯的匮乏,个人研究重点只能局限在当时大陆最早引进出版的台湾某些老作家作品的范围之内,先后撰写并刊发了几篇评论吴浊流、钟肇政、谢冰莹等早年活跃在台湾现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文学创作的文章,同时也有涉及台湾爱国怀乡诗作的评论文字面世。嗣后,逐渐转入对香港文学的关注与研究,不仅较多地参加了一些有关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全国性、国际性学术研讨活动,而且有机会受邀访学香港中文大学。个人对香港文学的研究,最先从香港文学研究之研究开始,写的亦是评论之评论式的理论析性文章;随后重点转移至香港现代散文研究,范围也涉及现代香港的多种类型散文,诸如香港学者散文、都市社会散文和大都会乡土散文等。研究成果亦多有长篇论文发表。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虽偶有作家作品论在海内外刊发,但数量太少,实在不成气候。实话实说,虽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个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性论文发表数量远多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但内心仍不满足,仍有遗憾。由于作家信息、作品文本、研究动态、学术资讯的匮乏与种种局限,个人在此一领域的研究,就只能局限在极为狭窄的层面上,选题也很难有较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缺乏更宽阔的驰骋天地。我想,假如文本条件更丰富,信息资讯更充足,交流渠道更畅通,学术视野更开阔,研究条件更有保障,相信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建设,不但可能有更宽的研究面,对文本的解读与透视及对作家的研究与观照,也可能在深度广度上会有较大的进展。所以多年以来,内心总有挥之不去的意犹未尽、遗憾失落之感。



在上世纪最后 20 年间,个人学术研究最为关注的另一热点,是张恨水研究,为此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所以如此,外因是张恨水研究在历经长时期非正常停顿后,终于迎来了回暖还阳的大好形势,而内因则似乎与个人对张恨水先生人生道路、思想人格及其各体文学创作认识理解逐步加深不无关系。张恨水既是一位人所皆知的近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又是一位产量极大造诣很高的散文大家,同时还是一位我国新闻史上享有盛名的资深老报人。他一生笔耕不辍,其文学创作始终走的是一条极重表现社会人生的写实主义道路,他的卷帙浩繁的多文体文学创作,他的始终如一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学写作路径,他的特别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他的反抗强暴、同情弱小的强烈正义感和平民意识,他的社会忧患意识和炽热的爱国之心,不仅使他理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册上占有重要地位,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对我们今天回顾反思与重新审视我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进程,都确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因为此,张恨水研究活动,我大都积极参加,持续时间也相当的长,直到退休仍兴味不减。对张恨水的研究,个人学术重点并不放在他那脍炙人口的百多部长篇小说,虽然也有论及张氏言情小说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特色的论文刊发,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研究重点却主要放在张恨水散文创作的诠释、解读及综合研究上,为此,不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广泛搜寻张氏散文资料,而且在张先生女儿张正女士的热情支持与大力协助下,精心编辑出版了《张恨水散文》(四卷本)一套,算是填补了张恨水研究的一大空白。在编书的同时,个人又连续撰写了几篇自感有些分量的论张氏散文的文章,也算是对张氏散文研究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回顾个人学术生涯,自觉成就不大,学术水平不高,但却体会很深,特别对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到来,始终怀有无限感激之情。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涌起,没有这种崭新历史情势的促动催生,个人恐怕很难有这几十万字的学术论文产生。

就文集内容而言,30 余篇文稿大多属于作家文本研究范畴,极少纯理性的宏观高论。这些研读解析作家文本的文论,只求平实解读作品,准确评论作家,原本就没有以理论高度的追求为学术目标。自我审视,这些文字,自觉也绝无故作高深之态,而多有实事求是之心;虽难一鸣惊人引人注目,但自忖个中大约还多少有些许个人化的东西。也许从拙作中能体味出个人的学术兴趣、研究路径、治学态度与行文特色。

多年的治学撰文,对作家文本研究始终高度重视,总是将其摆在学术研究的核

心位置。根本意图就在于想借助作家文本的研读透析,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从而达到深入理解文本、准确评论作家的终极目的。以文本研究为中心,似乎已成为个人的治学习习惯与基本行文方式。所以如此重视文本研究,大约源自于40年教学生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逐渐养成的职业特点。以教学实践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深化教学内容的重要手段,教学与研究相互渗透互动共济,教学与研究都必须建构于坚实的文本研究基础之上,大概正是这种较为个人化的治学为文特点形成的原因。

在长期教学与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中,个人不仅充分认识到文本研究在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而且也深感吃透文本并以此为桥梁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其实并不容易。但同时,在教学和治学撰文的长期实践中,对怎样才能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多少也积累了一些基本认知与肤浅体会。

要想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我想首先就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文本研究的基础地位与极端重要性。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家研究自然也就必须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依托和根本途径。作家文本既是其对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又必然体现着作家的主体意识,袒露出其真实的心灵世界。因之,要真正认识并公正而精准地评论作家,就必须从作品文本的研读分析入手,进而探索发掘精髓与真谛,最终才能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和心灵世界。这就要求研究者一定要特别重视作家文本的研读、诠释和理解,一定要把文本研读当作作家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基本功与基础工程来做。任何对文本研读的轻视或忽视,将一事无成,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将完全不能达到。

要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研究者一定要在对作家文本的细读、深读、苦读上下工夫。对此,笔者感受良多,体会很深。经验证明,只有认真研读并真正读懂作家文本的研究者,才能真正通达作家的文本世界,才能真正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品意涵,才能真正透视作家的主体意识,深入隐秘的心灵世界。轻视对作家文本的细读、深读、苦读,或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地浏览作品文本,是绝难真正走进作家文本世界的,最多也仅能朦胧地走近文本,根本谈不上读通读透读懂作家文本,真正的文本深入研究就更无从谈起。所以在我看来,真正读懂作家文本是做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做学问的根本原则和为学者最重要的学术精神。

做文本研究,写文本论评文章,一定要坚持从文本实际出发,紧扣文本固有的思想意涵、审美表现,对作家文本作扎扎实实的研读、符合实际的诠释、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这既是对作家文本的正视与尊重,又是真正进入作家文本世界的正确途



径。任何不正视文本实际,不坚持从文本实际出发,不紧扣文本实际做文章,都必然会出现错误与偏差,都不可能作出对作家作品公正准确而又切中肯綮的评价,都会完全无助于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化。因此个人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对作家研评而言,作品研究是第一位的;对作品文本研究而言,紧扣文本实际是最关键的;对撰写文本论析文章而言,坚持正视文本实际,一切从文本实际出发,是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和行文要求。

要真正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写出名实相符的文本研析文章,似乎在立足文本实际的基础上,还应当对文本作多角度、多层次而又全方位的审视、透析和论评。经验证明,撰写论文时,应该而且必须注意选择最恰当的视角与行文切入点,但审视与研读作家文本时,却又应当尽可能地对文本进行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观照与透析。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不仅有助于研究者对文本进行深入的解读、本质的把握,而且能更多地避免文本析评文章常易出现的种种局限。

确立并严格恪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学术观念和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作好学术研究、写好文学研究论文的根本保证,亦是个人多年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种学术理念。诚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似乎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但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仍然是科学的。运用这种科学的认识论与辩证的分析方法去审视与研究分析包括作家文本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最能本质地理解、准确地揭示作品文本的核心内涵与灵魂精髓所在,最能正确导引研究者深入作家的文本世界,也最能有效避免文本研读中常易出现的片面性与绝对化之类弊病,从而为对作家作品作出准确、恰当而中肯的评价提供正确的思想理论保证。而历史唯物主义所特别强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唯物的研究方法自然会非常有助于文本研究者力避文学历史研究中常易出现的非历史或反历史主义的错误,从而减少对文本不实事求是的误读错评。我们自然可以用今天的思想认识高度去回顾历史,但绝对不能用今天的是非标尺去苛求前人、评断历史,去审读指点前人的文本写作。

40年的教学生涯、30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中,最常做的功课便是作家文本的分析研究,这几十篇拙作以及所引发出的上述感受与思考,也都是个人文本研究成果和有关文本论评类文字写作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这些谄陋肤浅而又了无新意创见的认知理念,确实是个人长期教学学术活动中的真实体验与真切感受,这里信笔写



来,并没有丝毫作经验之谈的意思。

教书一生仅积累了区区几十篇文章,毫无学术造诣可言,每每念起,总感抱愧汗颜。虽然撰写这几十万字的学术文论时,个人自觉还算尽心尽力,也曾力求尽善尽美,但这些文字毕竟写于几十年前,早已走进了历史,个人水平和学术观念也都必然会有种种历史局限,疏失谬误不足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真诚期待诸君的指教匡正。

作者

2012年4月23日于绿缘居



目 录

序 言 / 001

走进作家的文本世界(代自序)/ 00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与文艺大众化 / 003

胡适与“文学革命” / 012

《子夜》思想浅论 / 024

茅盾散文概说 / 036

一个革命作家的独特奉献

——浅论周文同志的小说创作 / 048

热情拥抱时代生活

——论冰莹创作的艺术个性 / 058

朴素而崇高的美学追求

——评从维熙的《春之潮汐》 / 076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同异论 / 084

关于现代文学的学习与思考 / 087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乡情·亲情·民族情

——评《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 / 095

深深的民族哀痛

——评台湾作家吴浊流的小说创作 / 102

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

——评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 / 110

论黄维樑的文学批评意识 / 122

黄维樑文学批评的方法和风格 / 132

论黄维樑散文的主体意识 / 144

论黄维樑散文的艺术个性 / 157

黄维樑散文艺术论 / 176

陈政欣创作简论 / 183

东瑞散文论 / 193

咏赞神州风采 尽展域外风情

——东瑞游记散文简论 / 266

东瑞笔下的香港 / 275

东瑞散文中的心灵显示 / 278

大都会中的田园梦

——评陈少华散文的审美特征 / 281

略论陈少华散文的审美特征 / 294

张恨水研究

经纬交织 言在情中

——论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 / 301

透视作家心灵世界的窗口

——论张恨水散文《山窗小品》的主体意识 / 310

张恨水散文艺术的极致

——《山窗小品》艺术漫评 / 321

张恨水散文创作述略 / 331

张恨水现象：雅俗文学之交融与互补 /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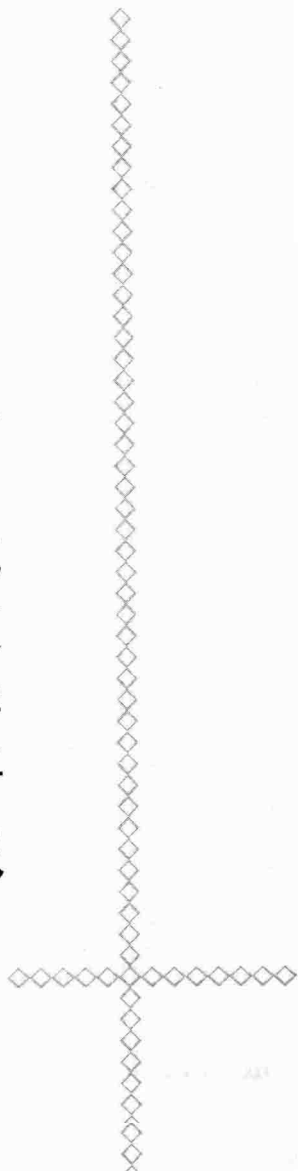
张恨水与张恨水研究 / 342

论“张恨水现象”的独特意义 / 346

后 记 / 359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鲁迅与文艺大众化

对文艺大众化的倡导，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作为左翼文艺运动旗手的鲁迅，对这个问题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迄今仍然放射出不灭的思想光辉。

什么是文艺大众化？在鲁迅看来，就是必须坚持文艺面向人民、服务大众的根本方向。他曾多次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文艺的大众化》）。这些话分明揭示了大众化的正确内涵和基本出发点。

当时，有人认为大众化就是通俗化，即要大众化，说话写作就“越俗越好”，甚至“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大众文化水准低，文艺必须“俯就大众”。某些被鲁迅称之为“新国粹派”者，更散布了许多所谓大众化必须迎合大众、媚悦大众的怪论。鲁迅在正确阐明大众化的含义时，批评了这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他一方面强调指出，“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论“旧形式的采用”》），倘若为大众所不懂，这文学就绝不是大众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大众化并不等同于通俗化，大众文学也并非越俗越好。所谓“俯就大众”、“媚悦大众”之类的见解，更与大众化的本义大相径庭。因为它不表明对大众的尊重，反而流露对大众的轻视；它不强调文艺家的化入大众，反而表现出对某些文艺家那种“俯就大众”的居高临下姿态的欣赏。对这类误解和曲解的危险性和危害性，鲁迅早在1930年的《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就曾提出过告诫，他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其后在《门外文谈》中又尖锐指出，这类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因为“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得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而且其明辨是非的能力，“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在20世纪30年代初，还有一些扬言要“消灭大众文艺”的自诩为“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他们攻击大众文化于文艺和大众“两无补益”，耻笑大众文艺艺术质量低劣，断言大众文艺绝对产生不出天才的艺术家和高超的艺术品来。在左翼内部也有人误认为大众文化必然损伤艺术价值，大众文艺难免艺术粗劣，因



而只能普及，绝难提高。鲁迅则不这样看。他认为大众化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降低，更不等同于艺术价值的破坏，恰恰相反，大众文艺肯定能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造出天才的艺术家，他坚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出托尔斯泰、弗罗培尔那样永留人间的天才作家来的”（《论第三种人》）。这种论断，不仅有力回敬了某些人对文艺大众化的非难，而且从又一个侧面说清了大众文化的正面含义。

既要坚持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根本方向，又要坚持文艺战斗性和教育作用，不能一味俯就；既要力求文艺形式的通俗易懂，又要注重艺术质量的精益求精，不能刻意粗俗；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意提高。这就是鲁迅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基本解释。

文艺为什么必须大众化？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坚持为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自从人类出现阶级分化以来，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应当为它的创造者服务这个真理却受到完全的歪曲。在剥削阶级看来，他们自己是“文学的祖宗”，而人民大众反成了“劣败的渣滓”。某些文学派别就高唱过“一切文明，都是少数的天才的创造”，“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愚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的”（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之类的调子，妄图以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大众掌握文化、鉴赏文艺的权利。在《文艺的大众化》等文章中，鲁迅严肃批评了这种蔑视大众、扼杀大众文艺的妄言，断然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所谓“作品愈高，知音愈少”，纯属胡说。

1934年问世的《门外文谈》，更是一篇维护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宣传书。这篇长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讨了文化的起源，对劳动人民创造文化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热烈赞誉。文章抨击了特权者对大众文化创造成果的窃取和垄断，以对文化起源与发展历史的详尽论述，揭破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少数“圣人”创造文化的谎言，剥落了特权者强加在文字和文学上的“尊严性”和“神秘性”，为无名的文字创造者和不识字的作家树碑立传。鲁迅指出，文字的形成固然是劳动人民世代创造的成果，文艺又何尝不是古代无数“不识字的作家”的创作呢！“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流传在我们祖先口头的文学，固然是“杭育派”作家的杰作，“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即便是《伊利亚特》、《奥德赛》、《子夜歌》、《读曲歌》、《竹枝词》和《柳枝词》……也“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至于现代的民谣、山歌、渔歌和童话、故事，不也正是现代的不识字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吗！因此，鲁迅斩钉截铁地说：“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其智慧和创造力，是往往连知书识理的文人也要叹服的。所以，文艺为它的创造者服务，